

近现代中国之出路

周文顺

中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而又极富创造力的优秀民族；历史上的中国，曾几度出现极其辉煌的时代。然而，近代以来，腥风血雨，风声鹤唳，山河残破，民生凋敝，中国人民呕心沥血，苦苦奋争，却始终不能摆脱“贫穷”、“落后”、“屈辱”的追逐！为什么？

这是每一个正直、聪慧，以民族和国家命运为己任的中国人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近现代中国革命必须解决的问题。

帝国主义与中国的贫穷落后

1840年以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然而，正当这个背负着沉重的两千年封建文明的泱泱大国循其典型的中庸之道的的方式向资本主义缓缓蠕动时，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却已急剧膨胀，发展到了对外扩张、排泄经济危机的地步，并开始觊觎中国。中国的市场、中国的落后，东方人敦厚善良的美德，令西方列强垂涎。

1829年，英国资产阶级代表柏金汉曾公开发表演说：“中国有着庞大的人口，其人富于积极的消费性格，如果把那个国家的市场开放给自由贸易商人，则英国货在那个市场上的销量将比其余

全部世界的总和销量还要大。”〔1〕然而，纺织品不足以打开中国市场，英国殖民者运来了鸦片。

一方面，英国通过鸦片贸易获利甚丰，并为其工业化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一方面，鸦片严重危害中国社会，中国兴起了以虎门销烟为主要标志的禁烟运动。英国为强行向中国倾销鸦片，于 1840 年发动了可耻的鸦片战争。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战败。1842 年 8 月，战败的中国被迫与英国签订了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南京条约》的签订，使英国殖民者欣喜若狂。代表英国签约的璞鼎查在国会绘声绘色地宣称：“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广阔，倾兰开夏全部工厂的生产也不够供给她（中国）一省的衣料！”还有人描绘的更其动人：“只消中国人每人每年需要一顶棉织睡帽，不必更多，那英格兰现有的工厂就已经供给不上了”〔2〕。与此同时，其他殖民主义国家亦纷纷图谋中国。曾任美国总统的亚当姆斯（J. Q. Adams）公开为鸦片战争喝采：“不管正当不正当，这个战争是按照神意用以开创我们与这个广大帝国关系的新纪元的。”〔3〕美国驻华专使马德利则称中国是“美国企业的一个广大领域，美国商业的无涯市场”，“只要整个内地都开放，中国就会成为美国工业品之最有价值的市场。其价值大于美国现时所能进入的全世界一切市场之总和。”〔4〕日本也加紧制定大陆政策：“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5〕俄国则处心积虑地推行所谓“黄俄罗斯计划”，企图吞并中国东北地区，认为在

〔1〕《经济研究》1955 年第 1 期

〔2〕《经济研究》1955 年第 2 期。

〔3〕《帝国主义侵华史》第 1 卷，第 56 页。

〔4〕《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第 12 页，人民出版社，1973 年版。

〔5〕《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文集》第 44 页。

“当地居民爱好和平，中国人很软弱的情况下，占据黑龙江两岸是方便可行的”。〔1〕其外交大臣甚至认为：“中华帝国的解体，在各方面都是合意的”。〔2〕

随着各帝国主义势力纷至沓来，不平等条约纷纷订立。如：1844 年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1858 年的中英、中法、中俄、中美 4 个《天津条约》，1860 年的中英、中法 2 个《北京条约》，1858 年沙俄强迫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的《璦琿条约》，1864 年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74 年的《中日台湾事件专条》，1876 年的中英《烟台条约》，1885 年的《中法新约》，1890 年的中英《藏印条约》和 1893 年的中英《藏印续约》，1894 年的中英《滇缅界务商务条约》，1895 年的中日《马关条约》，1896 年的《中俄密约》及《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1898 年的中德《胶澳租界条约》，中俄《旅大租地条约》及《续订旅大租地条约》，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1899 年的中法《广州湾租界条约》，1901 年中国与英、俄、美、德、日、奥、法、意、西、荷、比 11 国订立的《辛丑条约》，1911 年中俄《满洲里界约》，1915 年的中日《二十一条》，1946 年的《中美商约》等等。此外，各帝国主义国家还撇开中国中央政府泡制了一些从来不为中国政府所承认的“条约”，诸如 1867 年的“浦安臣条约”，1900 年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1914 年的“西姆拉条约”，1932 年的“日满议定书”，1939 年的“日汪协定”等等。

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使帝国主义获得种种特权。他们在中国飞扬跋扈，恶贯满盈，为患百年之久，强迫中国割地、赔款，肆无忌惮地屠杀、掠夺、焚烧……卑行种种，劣迹斑斑，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中华民族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和灾难。

〔1〕 转引自《帝国主义侵华史》第 1 卷，第 135 页。

〔2〕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资料选译》第 366 页。

割地 仅以沙俄为例，1858~1864 年间，通过《璦琿条约》、《北京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三个不平等条约，即割占中国领土 144 万平方公里。这一面积约相当于 6 个英国，占今日中国版图约 15%。

赔款“赔款”乃是各种不平等条约中最常见的条款，而且数额巨大。例如，《马关条约》所规定的中国赔款高达 2 亿两白银。（若将辽东半岛“赎金”计算在内，则高达 2 亿 3 千万两）当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也不过 1 亿两白银，而日本财政收入仅 0.8 亿日元，这笔款项加上利息等，相当于当时日本全年财政收入的 3.5 倍至 4 倍。^{〔1〕}如此巨额款项，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同时也为日本近代经济的崛起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据统计，日本将中国赔款的 90% 用于扩军，从而带动了日本钢铁、煤炭、造船、铁路工业的突飞猛进。日本近代钢铁企业中心——八幡钢铁公司便是用《马关条约》的赔款建立起来的。此外，日本获得巨额赔款，使它具备了改银本位制为金本位制的基础，促进了银行业的迅速发展，使日本金融市场和欧美密切联系起来，对外竞争力大为增强。正是以中国赔款为起点，至 1904 年，这十年中，日本公司数量由 2844 家增为 8895 家，实缴资本由 24500 万日元增为 91300 万日元；机械动力工厂，从 675 家增为 3741 家。^{〔2〕}日本近代工业的主要部门都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

然而，《马关条约》所规定的赔款并非为至钜者。《辛丑条约》所规定的中国赔款数额更高达 4.5 亿两白银，（按规定，此款分 39 年还清，本息共计 9.8 亿两白银。加上地方赔款 2 千万两白银，因此亦有 10 亿两之说。）其赔款数额之大，在当时全世界是破天荒的。

〔1〕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第 299~300 页，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

〔2〕 《资料卡片杂志》1994 年第 22 期第 1 页。

占领 除通过“条约”割占土地以外，各帝国主义还以“租界”和“租借”的形式强占中国领土。如当时的上海、广州、天津、武汉等地，均有外国殖民者圈定的“租界”，其内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等一应俱全，俨然成了“国中之国”；各帝国主义以“租借”名义占领中国领土的事件也辄有发生，仅以 1898 年为例，是年，德国强租了胶州湾，并攫取了在山东筑路、开矿的权利；沙俄租借了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海域，租地内中国不得驻军，军政大权归俄国；英国则租去了威海卫及其附近海域，并强租了九龙半岛及其附近岛屿；日本在英、德支持下，强迫清政府允诺不将福建及其沿海租让他国，以形成日本瞰制福建的局面。1899 年，法国租借广州湾及其附近海面，并攫取了在广州、昆明之间筑路并敷设电线的特权。

此外，各帝国主义还为其殖民利益在中国展开激烈的角逐，通过明争暗斗，达成种种协议和默契。甲午战争后的短短几年内，中国出现了这样一幅局面图：俄国盘踞长城以北，英国控制长江流域，法国据有两广和云南，德国雄踞山东，日本霸占台湾、福建。偌大中国，几乎被帝国主义瓜分殆尽。

进入现代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成为中华民族最凶恶的敌人：1931 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1937 年继发动旨在灭亡全中国的侵华战争，将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华东置于其统治之下。

屠杀 仅举两例：1900 年，沙俄侵略军制造了海兰泡和江东 64 屯大屠杀。据不完全统计，在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人被“枪毙、水淹、火焚不下 20 余万”〔1〕。瑗珲瑋春一带，被“屠戮了数万名中国百姓”〔2〕在这次屠杀中，俄军“各持刀斧，东

〔1〕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641 页，明清档案馆编。

〔2〕 《近代中国八十年》第 384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砍西劈”，黑龙江“骸骨漂溢，蔽满江津”。〔1〕1937年，日本侵略军制造了南京大屠杀事件。“据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被集体射杀、火焚及活埋者达19万余人，被零星屠杀者达15万人，合计为35万多人”。〔2〕全市房屋大部分被焚烧，南京顿成人间地狱。

掠夺 早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个时期，针对各殖民者在中国沿海走私、贩毒、掠卖人口、充当海盗等等行径，恩格斯即曾指出，这些人“保留了大量的为我们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共同祖先所特有的古老的海盗式掠夺精神”。〔3〕甚至英国驻华领事也不得不承认，“来自各国的这群外国人，生性卑贱，无有效的管束，为全中国所诟病，亦为全中国的祸患，他们放纵强暴”，乃是“欧洲各国人的渣滓”。〔4〕而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其掠夺行径愈演愈烈。

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为例：日军自供，“只天津一处抢劫所得者，即有200万两之多”。〔5〕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纵兵抢劫三天，日军从清政府户部国库中，又抢得263万两白银。美军也抢得几百万两银锭。法国大主教樊国梁（A. P. Farier）从户部尚书立山私宅中抢走了价值100万两白银的财富。而在颐和园，侵略者“括其所有”，用骆驼运往天津，竟运了几个月。〔6〕联军司令瓦德西《拳乱笔记》称：“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7〕

经济侵略 1895年以前，外国资本主义主要是凭借不平等条

〔1〕《瓊瑯县志》卷8。

〔2〕《中国革命史》38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86页。

〔4〕见大公报《史学周刊》第75期。

〔5〕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第377页。

〔6〕据《近代中国八十年》第380页。

〔7〕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第377页。

约所规定的种种优势，向中国倾销商品，购进廉价原料，将中国作为其商品市场和原料市场。例如，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典型的贸易出超大国，每年约出超数百万两白银；鸦片战争后，由于鸦片大量侵入〔1〕，中国贸易由出超而为入超；从 70 年代起，即使撇开鸦片一项，中国也由出超而为入超；至 90 年代初，每年入超竟高达 3~4 千万两之巨〔2〕。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孚石油公司一资本家自豪地说：在中国，“虽穷乡僻壤，向不知煤油为何物者，今亦无不需用吾人之产品矣。”〔3〕1946 年，上海永安等大百货公司的货单上，美国货占 80%。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中国的出口贸易也日益适应外国资本主义的原料需要。例如，在正常情况下，中国每年出口棉花约 0.8 万担，豆类约 5.7 万担，可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日本纺织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棉花和豆类，中国 1891~1893 年平均每年出口棉花增为 29 万担，豆类 76 万担。〔4〕显然，中国已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市场。

1895 年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由商品输出上升到资本输出阶段。早在 1895 年前，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已有投资，但数额较少。1894 年，外来投资总额为 2~3 亿美元。1895 年后，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显著增长，至 1941 年已高达 91.6 亿美元，相当 1894 年的 30~45 倍。〔5〕1936 年，在中国全部近代工矿、交通等企业资本总额中，外国资本占 71.6%。〔6〕

1895 年《马关条约》订立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帝国主义控制

〔1〕 全慰天《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第 259 页。

〔2〕 据《中国革命史》第 27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

〔3〕 《申报》1914 年 4 月 5 日。

〔4〕 同注〔2〕。

〔5〕 全慰天《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第 254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6〕 同上书，第 255 页。

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其步骤为：首先控制金融、财政，其次控制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再次控制交通，再次控制工矿，最后通过上述各个方面的控制，左右中国社会经济的主体部分——农业和手工业。在这一系列活动中，首当其冲是控制金融。外国在中国设立银行始于 1845 年，主要有英国的汇丰银行，法国的法兰西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俄国华俄道胜银行，美国花旗银行等等。甲午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些银行。尤其英国的汇丰，美国的花旗，堪称掌握中国经济命脉的“太上皇”。因为它们拥有发行钞票、吸收存款、保管关税和盐税的现款等等特权，而且保管的税款不负担利息，吸收的政府存款也不必负担利息或利率很低。^{〔1〕}因此，它能够大量低息率放款。无论洋行、华商，无论中国的钱庄、银行，还是历届中国政府，都是其放款对象。这样，它们只需稍稍调整放款的数量或利率，便可控制某些经济和政治部门的活动，并进而对整个国家经济产生严重影响。

政治控制 仅以《辛丑条约》为例，该约规定：“准许各国在北京到山海关的铁路沿线的十二个战略要地派兵驻扎；从大沽口至北京一线所有炮台一律削平；天津周围 20 里之内不准中国驻军；禁运军火；北京东交民巷一带辟为‘使馆区’，驻扎外国军队，中国人不得自由出入；禁止中国反帝运动，清朝地方官吏所属境内如有“违约行为”，必须立即弹压惩办，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如此等等，通过这些，各帝国主义已在政治上、军事上将中国置于其严密控制之下。

文化侵略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对华文化侵略主要是通过宗教的形式进行的。1844 年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规定了西方传教士在华自由传教的特权。1846 年清政府正式废除禁

〔1〕《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264~265 页。

教令。从此，西方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尽管他们中间亦不乏真正传播“福音”的教徒，然而一般说来，却多为“用宗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1〕甚至不少传教士本身即是殖民主义官员。例如：第一个在中国鼓吹“领事裁判权”的马礼逊，即是英国传教士，并担任了英国副领事级外交官；参与起草《南京条约》的马儒汉，也是英国传教士，并参加了英国侵略军；第一个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伯驾，参与起草了《望厦条约》，以后并充当了美国驻华公使；中美《天津条约》起草时，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和丁韪良分别任秘书和译员；《辛丑条约》的主要起草人，是美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美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是一个传教士，他签订了《中美商约》〔2〕。总之，这些传教士大多是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

西方传教士为了其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目的，竭力向中国人灌输崇洋媚外思想，“造就服从他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3〕，不仅组织教会，发展教徒，并且广设教会学校，招收学生，供其毒害。据统计，他们经过百余年苦心经营，在中国先后发展教徒达 370 万；到 1926 年，教会在中国开办的学校达 15000 所，学生约 80 万人〔4〕。这些深受殖民主义文化毒害的中国人，面对国难家仇，麻木不仁者有之，为虎作伥者亦有之。1871 年《东方杂志》第 1 卷第 9 期评述称：这些经长期宗教熏陶和奴化教育的人，“即有一二稍有智识者，亦大抵濡染西人风习，日以媚外为事，不知爱国为何物。则所选人才，亦仅供外人之使用而已”。此说未免夸张。然而，我们从前美国协和医院院长顾林致国民党美国顾问兰安生的信件中，似也能见到帝国主义在中国推行

〔1〕 《中国的战争》载于《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214 页。

〔2〕 据吕鸿儒《宗教的奥秘》第 116~117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3〕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93 页。

〔4〕 据吕鸿儒《宗教的奥秘》第 117~118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殖民主义文化毒害的深刻影响。其信称：用 100 万美元来支持各教会大学，比用 200 万美元来帮助蒋介石维持军队更具效果。军队还会叛变，至于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则忠诚不变^{〔1〕}。

封杀民族资本 近代以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甚至濒临破产，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帝国主义的封杀。

如前所述，帝国主义通过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种种特权，对华强力输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正是在此情形下，它们在市场上拥有中国民族资本几乎无可抗拒的优势。

首先，在资金方面。据统计，1895~1913 年，资本 1 万元以上的帝国主义在华工矿企业，共 136 家。它们设立时的资本总额为 10315.3 万元，每家平均 75.8 万元。^{〔2〕} 同期设立的民族资本，万元以上者 463 家，资本总额 9181.2 万元，每家平均 19.83 万元。^{〔3〕} 而由于外资企业资本多在 1 万元以上，中国民族资本则多在 1 万元以下，甚至资本不足 5 千元者近半数，具体到行业竞争，彼此悬殊更其突出。例如：1913 年，英商开滦煤矿资本额为 2063 万元，而是年中国所有 41 家煤矿的总资本额也不过 1410 万元；英商耶松造船厂的资本额为 772 万元，而中国所有 22 家机器铁工厂的资本总额仅 148 万元；英商上海工部局电气处的资本额为 961.5 万元，而中国所有 40 家电厂的资本总额为 1380 万元；英商英美烟公司的资本额为 1100 万元，而中国所有 20 家纸烟公司的资本总额为 137.8 万元。^{〔4〕} 这种经济实力的强烈反差，在市场竞争中将民族资本置于被动境地。

其次，在技术水平方面，中国民族工业的技术设备大多由西方各国进口，而帝国主义者为保持其在中国市场上的优势地位，在

〔1〕 转引自《宗教的奥秘》第 118 页。

〔2〕 全慰天《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第 201 页。

〔3〕 同上书，第 199 页。

〔4〕 全慰天《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第 201 页。

技术设备方面，对民族工业，刻意封锁。英国公使欧格纳曾说：中国“机器进口，恐非西国之福也。”〔1〕这样，在帝国主义封锁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所购置的机器，大多是过时的、七拼八凑的陈旧设备，更不敢言配套成龙。因此，有人戏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为“五花八门的杂货店”“古董店”“古董陈列所”〔2〕等等。济南有一家玻璃厂，制造门窗玻璃，由于设备不全，只好采取把玻璃吹成薄球，然后再剪成薄片的做法。〔3〕一方面是由于各帝国主义的技术封锁，一方面由于资金有限，各帝国主义在华企业的动力化程度遥遥领先于中国。据 1908~1911 年统计，美国在华企业每个工人使用的动力为 3.6 马力，德国 3.9 马力，法国 2.8 马力。而中国直到 1947 年，经在全国主要城市中的 14078 个工厂调查，每个工人使用的动力仅为 1.2 马力。〔4〕技术水平方面的彼此悬殊，决定了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张之洞曾指出：洋人“纺纱、染沙、轧花、提花、悉用机器，一夫可抵百夫之力。”〔5〕而据 1937 年以前统计，中国每个工人的生产效率，仅为美国工人的 1/19。〔6〕

除上述资金、技术条件以外，加上帝国主义在华获得的种种特权，如军舰走私、飞机走私、不纳关税、运费也低等等，这一切造成了其产品的“物美价廉”。1946 年，上海的美国汽油竟与南京的开水价钱一样；美国煤每吨 7 元，国产煤每吨 13 元；〔7〕美国水泥每包售价仅 1.8 元，而国产水泥每包的成本即达 3 元〔8〕，售

〔1〕《论机器不宜进口》载于《皇朝蓄艾文编》第 27 卷。

〔2〕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4 期，第 50~55 页。

〔3〕全慰天《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第 210 页。

〔4〕《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4 辑，第 9 页。

〔5〕《张文襄公全集》第 26 卷第 6 页。

〔6〕《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4 辑

〔7〕《工商导报》1946 年 7 月 24 日。

〔8〕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 辑第 405 页。

价当然更高。这一局面使帝国主义在华企业于激烈的市场角逐中，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民族工商业置于死地。

此外，帝国主义者还常常采取非经济手段颠覆民族工商业。1919年，英美烟公司为了挤跨和吞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曾私下送给北洋政府农商部 20 万元的贿赂，请求勒令南洋停业，一度把南洋搞得人仰马翻^{〔1〕}。

在各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的封杀之下，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如野海孤舟，随时都面临颠覆的危险。据 1933 年调查，上海一些较大工厂，平均寿命只有 8 年零 4 个月，小厂则“蟪蛄不知春秋”，鲜有维持数十年者。^{〔2〕}

下列简单的数据，也颇说明问题。1840 年，中国工人阶级产生，至 1914 年，经 70 多年的长期发展，仅达 100 万人。而从 1914 年至 1919 年，仅 5 年，中国工人阶级却迅速增至 200 万人。众所周知，1914 年至 1919 年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在此期间，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壮大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而中国资本主义之所以急剧发展，则是由于各帝国主义忙于战争，致力军火生产，一时无暇占领中国民用市场。可见，近代以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帝国主义压迫。否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亦会迅速发展起来。

总之，1840 年以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加深，中国山河破碎，白银外流，生灵涂炭，主权尽失，资本主义难以发展，封建主义得以延续。帝国主义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总根源。

封建主义与中国的贫穷落后

1840 年以前，中国是一个完备的封建社会。政治制度，以

〔1〕《上海经济史话》第 1 辑，第 101～102 页。

〔2〕同注〔2〕，第 31 页。

“皇帝统治国家”为标志；经济制度，以“地主占有土地”为根基；社会生产形态，以“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本特征。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随着各帝国主义日益深入的侵略，中国封建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遭到严重破坏。然而，中国社会最反动最腐朽的压迫和剥削制度的根基，却依然根深蒂固。其主要表现于下面诸方面。

政治 个人极权主义是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核心。1840～1949一百多年间，尽管中国社会几经沧桑，先是皇帝的统治，继而北洋军阀的统治，乃至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历届政府，兴衰更迭，花样翻新，或赤裸裸地贯彻“皇权”，或假惺惺地标榜“民国”，但究其本质，无一不是高度体现统治者个人的意志，绝少民主可言。

维新派主将梁启超曾针贬清朝统治“收人人自主之权，而归诸一人，以一人而夺众人之权。”〔1〕叹曰：中国“历古无民主”是中国社会进化缓慢，长期积弱不振的主因。〔2〕民国先驱邹容则称，中国“秦汉以后无国民”，“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他认为清朝统治者“私其国，奴其民”，将国家“窒息于专制政体之下”。〔3〕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然而，昙花一现。随袁世凯窃国，北洋军阀的统治建立，新生的‘民国’婴儿，被一步步肢解殆尽：1913年，袁世凯以临时大总统身份派军警、便衣包围国会，武力强迫国会议员将其“选”为正式大总统；1914年，袁又颁布《总统选举法》，将其定为终身总统，并有权传子世袭。与此同时，袁世凯

〔1〕《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载于《饮冰室合集》文集一。

〔2〕《与严幼陵先生书》，载于《饮冰室合集》文集一。

〔3〕邹容《革命军》。

还下令解散国民党、国会、国务院，废除《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无限制扩大总统权力。甚至逐步恢复了清朝官吏品级制度，设所谓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等名目，改民政长官为巡按使，改各道观察为道尹，改都督为将军等等。总之，仅仅两年时间，“所谓共和，徒存虚名，易其名则帝制成矣！”^{〔1〕}。而 1915 年 12 月，袁世凯则进一步发展到公然称帝的地步。并自编自导演出了一幕“民意”、“劝进”和“拥戴”的闹剧。对此，梁启超的鞭鞑精辟入里：“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2〕}继袁之后，北洋军阀历届政府也一概都是挂“民国”的羊头，卖“封建专制”的狗肉。

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亦大致如是。例如，1946 年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制定了一部伪宪法——“中华民国宪法”。该“宪法”基本精神有两点：第一，确认蒋介石个人独裁。其第四章规定，“总统有权召集国民大会、统率全国海陆空军，对外宣战和缔约媾和、宣布戒严解严、任免一切文武官员、五院正副院长的提名以及解决五院之间的纠纷”等等。这样，“所谓的国民总统就其权力而言，无异专制的皇帝”^{〔3〕}。第二，剥夺人民民主权利。在形式上，这部“宪法”虽然也承认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宗教以及选举、被选举等等自由，但由于其第 23 条规定，“以上各条列举之自由权利，除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4〕}。因此，上述种种所谓“自由”，是毫无保障的。

〔1〕 《申报》1914 年 4 月 12 日。

〔2〕 陈旭麓《近代中国八十年》第 551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3〕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简编》，北京出版社，1986 年版，第 328 页。

〔4〕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简编》第 328 页。

因为在这里“宪法”已经预设了 4 条“以法律限制”人民自由的理由，即“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增进公共利益”。国民党政府可以随时随地根据这些“宪法”规定，名正言顺地镇压人民。1949 年以后，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而后在台湾宣布“戒严”长达 39 年，便是套用这一“宪法”规定，剥夺台湾人民的种种民主权利的实例。

组织 宗法血缘关系是中国封建组织制度的基础。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组织关系不再纯粹以原始的血缘关系为认同。而是逐步由血缘关系而推及派系关系，由家族血亲关系的认同而演绎、派生出门生故吏、亲信死党等社会关系的认同。但是，无论这种关系怎样发展，其最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核心，仍是宗法血缘关系。从前清八旗，到北洋派系，乃至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四大家族，均无例外。

这种封建宗法组织制度，以高度体现统治者个人意志为特点。上至国家决策机构，下至大小政府部门，官吏的升迁任免，都是一个人说了算。于是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反之，一人犯法，株连九族。君臣如父子，天下如一家。整个社会，俨然成了以各种宗法关系纠结起来的一张巨大的关系网。

这种封建宗法组织制度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有三：第一，政治专制。组织上的高度集权必然造成政治上的专制统治。家庭中，子以父为尊；国家里，臣以君为纲。自下而上，绝对服从。诸如“家天下”、“父子兵”、“裙带风”、“家长制”、“一言堂”、“长官意志”、“官僚主义”等等社会弊害，均系这一封建宗法制度的表现形式或衍生物。第二，政治愚昧。由于选官任人必先考虑与统治者的血缘和派系。地位等级则取决于和当权者关系的亲疏。这种状况最终导致了“中国封建政治中‘用饭桶不用油桶’的反智主义。温顺、听话、愚忠，成为官吏的美德；投机、钻营、拍马，成为晋身官场的惯伎。于是乎，一方面德才兼备的政治贤达往往由于

朝中无人而不事阿谀奉承被拒之门外；一方面，醉心官场的政客将全副才能和智慧致力于钻营派系和逢迎拍马而往往得逞；同时，宗亲圈内仅有的一点点智慧和理性也多在长期违心盲从的政治“家风”中逐渐消磨。加之对上峰长官的迷信和崇拜又演化出对先王、祖制的恪守与继承：“先帝遗训”、“祖宗家法”被奉为经典神明；“法古”、“师古”、“法先王”成为天经地义的法则；反之，稍有超越和变革，便触犯了“离经叛道”之大忌。如此等等，这一切最大限度地抑制了人的智慧和理性的发展，使“盲从”、“排外”、“保守”、“愚昧”成为中国封建政治不可克服的属性。第三，腐败。由于选官任人以封建宗法关系为唯一原则，这种制度注定了中国官场中的每一角色都不是孤立存在，都在封建宗法关系网中居有一定的位置。因此，他们在统治、剥削人民的过程中必然密切配合，相得益彰，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某一角色出现问题，为不致导致整个封建关系网的破裂或整个封建统治秩序的坍塌，封建宗法体系便会本能地做出“官官相护”的反应。这种“保护”，使腐败现象得以助长。封建专制政治中最普遍的“一代不如一代”的显著退化现象，也是以这种宗法组织制度为根源的。

经济 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近代以来，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然而，就广大农村而言，仍然是典型的封建经济。延续二千年之久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在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着，成为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

例如，抗日战争前夕，除东北以外，全国地主占农村人口 4%，却占有土地 50% 富农占农村人口 6%，占土地 % 。直至解放前夕，情况仍大致如是：华北、中南地区，地主占有土地 30~

〔1〕《中国地地问题与商业高利贷》第 65 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

50%；四川等地，地主占有土地 70~80%^{〔1〕}。

中国农村的土地集中程度非常高。例如，清末河南南阳“彭善人”一家，拥有土地 8.6 万亩。^{〔2〕}李鸿章兄弟 6 人占有的土地，仅合肥一地，即达“每人平均约有 10 万亩；其在外县者，更无论矣”^{〔3〕}。袁世凯一家占据河南彰德土地达全县 1/3^{〔4〕}。徐世昌在河南辉县占地 5 千多亩^{〔5〕}。孔祥熙仅在山西、张家口一带占地即高达 60 万亩^{〔6〕}。安徽灵璧大地主卓懋廷也占有土地 7.8 万亩^{〔7〕}。山东孔府占地更高达 200 万亩^{〔8〕}。土地高度集中于地主阶级，广大农民沦为佃户，承受着沉重的地租剥削。

旧中国地租额非常高。以购买年（即租额购买土地的周期）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地租额购买年为 20 年，英国为 27~30 年^{〔9〕}。中国购买年则短得多。例如，1912~1927 年间，山东莱阳为 9.3 年，广东为 6.5 年，山西五台为 4.6 年^{〔10〕}；1934 年，全国一般购买年为 7.09~9.06 年^{〔11〕}。购买年短，说明租额高。据 1922 年调查，中国有些地方土地租额购买年甚至仅为 1 年，即“一年之租，即可购得该田”^{〔12〕}。租额之高，使农民不堪负担，随时面临着破产。如清末陶煦《租 粟》所记：“吴中之田，十九与绅富共有之也。上衣不过赁十亩，亩入不过二石余。取租而平，则

〔1〕 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载于《新华月报》1950 年第 2 卷第三期 49 页。

〔2〕 《人民日报》1964 年 3 月 11 日。

〔3〕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资料》第 1 辑第 182 页。

〔4〕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简编》第 15 页。

〔5〕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2 辑，第 14 页。

〔6〕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3 辑第 993 页。

〔7〕 《历史研究》1965 年第 4 期，第 29~34 页。

〔8〕 见《孔府简介》。

〔9〕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310 页。

〔10〕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2 辑，第 113 页。

〔11〕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310 页。

〔12〕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2 辑，第 112 页。